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记

· 下 编 ·
第五卷

主编 李文海
孔祥吉



清史编委会 编

清代人物传稿

• 下编 • 第五卷

主编 李文海 孔祥吉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沈阳

清代人物传稿
Qingdai Renwu Zhuangao

下 编

第五卷

李文海 孔祥吉 主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锦州印刷厂印刷

字数:346,000 开本:850×1168 $\frac{1}{2}$ 印张:14 $\frac{3}{4}$ 插页:4

印数: 1—1,056

1989年11月第1版

1989年1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 彻 高 虹 责任校对:周 全
封面设计:赵多良

ISBN 7-205-1214-7/K·108

定价:5.70元

本书为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历史学科重点项目，在
撰写过程中，得到国家资助。

《清代人物传稿》下编

编委会成员

戴 逸 林增平 苑书义

李文海 林言椒

目 录

杨昌潜	杨东梁 (1)
曾纪泽	钟康模 (6)
丁日昌	周 源 (14)
陈兰彬	刘 可 (19)
陈宝琛	张革非 (23)
刘永福	杨遵道 (29)
丘逢甲	潘国琪 郭汉民 (39)
徐 骧	钟康模 (46)
怀塔布	孔祥吉 (51)
寿 富	孔祥吉 (57)
赵舒翘	张应超 (63)
许景澄	房德邻 (70)
长 顺	薛衍天 (76)
增 祺	薛衍天 (82)
魏光燾	马少侨 (86)
陈夔龙	严昌洪 李守毅 (91)
赵尔丰	迟云飞 (98)
袁世凯	侯宜杰 (106)
程德全	鲜于浩 (122)
陆荣廷	刘强伦 (130)
康有为	汤志钧 (137)

林 旭	杨益茂 (153)
王 照	孔祥吉 (158)
汪康年	林克光 (166)
熊希龄	周秋光 (173)

黎元洪	萧致治 (183)
汤化龙	潘振平 (194)
汤寿潜	闵 杰 (201)
罗 纶	鲜于浩 (210)
杨 度	陈珠培 (217)

胡汉民	饶怀民 (226)
廖仲恺	饶怀民 (233)
于右任	姜笃勤 (241)
张 继	李育民 (248)
陶成章	郑云山 (254)
王金发	饶怀民 (265)
姚雨平	杨鹏程 (272)
黄泽霖	冯祖贻 (278)
杨卓林	陈珠培 (282)
姚宏业	郭世佑 (286)
詹大悲	陈 辉 (290)
张凤翔	张应超 (296)
章士钊	饶怀民 (302)

王国维	李修生 (310)
-----	-----------

苏曼殊	裴效维 (320)
王闾运	马积高 (329)
樊增祥	严昌洪 (337)
曾朴	黄钧 (343)
刘鹗	黄钧 (348)
吴昌硕	张同霞 (353)
任伯年	郑经文 (359)
吴友如	郑经文 (367)
孙菊仙	李宗白 (370)
潘月樵	金耀章 (376)
田际云	陈义敏 (381)
马相伯	姜义华 (386)
吴嘉善	刘可 (394)
章楠	吕英凡 (399)
朱沛文	郑金生 (404)
张锡纯	傅芳 (409)
唐宗海	吕英凡 (414)
荣宗敬 荣德生	尤学民 (420)
经元善	虞和平 (428)
薛南溟	汤可可 (436)
林乐知	夏良才 (441)
犬养毅	赵军 (447)
山田良政	赵军 (452)

杨 昌 濬

杨东梁

杨昌濬（？—1897），字子源，号石泉，又号镜涵。湖南湘乡人。二十五岁时，补县附学生员。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入湖南，他随罗泽南在籍组织团练。四年（1854年）夏，从罗泽南转战湖北。十月，湘军罗泽南部攻太平军于田家镇对岸半壁山，杨昌濬逞勇先登。罗部连陷广济、黄梅，杨亦“积功”为训导（县学教官副职）。九年（1859年），因办理团防，升教授（府学教官）。

咸丰十年（1860年）五、六月间，左宗棠在长沙编练“楚军”，杨昌濬应邀入幕。八月，“楚军”取道醴陵入赣。十月，杨昌濬与总理营务王开化率领四营败太平军于赣东北之枫树岭。十一月，陷德兴、婺源，遂迁知县，加同知衔。

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左宗棠任浙江巡抚后全师入浙，时太平军侍王李世贤南趋江山，驻石门花园港。三月，左军进江山，杨昌濬与刘典、刘璈分三路攻石门，破垒七座，终因太平军奋力坚守，未能得逞。七月，左宗棠攻龙游（今并入浙江省衢县、金华县），杨昌濬败太平军于莲塘、孟塘。李世贤以龙游告急，分兵三路赴援，中路取清军刘培元营，杨昌濬凭山下攻，击破中路太平军。九月，迁衢州府知府。

时天京（今江苏南京市）告急，李世贤以李尚扬、李遇茂、刘政宏等扼守汤溪（今并入浙江金华县）、龙游、兰溪，自率一

军回援。二年（1863年）正月，清军陷汤溪。龙游太平军因腹背受敌，弃城东走。杨昌濬等蹑踪追至汤溪，与清军蒋益澧部内外夹击，再败太平军。九月，授浙江粮储道。十一月，与蒋益澧、黄少春等合兵共一万三千余人进攻余杭西北。十二月初三（1864年1月11日），杨昌濬进攻杭州北门，两军激战。其时，雨雪兼旬，太平军坚守不动。二十五日（2月2日），天气放晴，杨昌濬等连破余杭五卡。翌日，再攻余杭北十里的林清堰（康王汪海洋驻地），中伏败退。

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4月1日），破杭州、余杭，加按察使銜。三月，左宗棠入杭州，杨昌濬奉命督亲军北上，攻占湖州府（府治在今浙江吴兴县）武康县城（今并入浙江德清县）。再分兵进驻三桥埠，与湖州南路清军连成一气。五月，湖州太平军西走泗安、梅溪，杨昌濬由牌头进桐岭拦截。六月，北攻安吉受挫。七月，安吉太平军弃城西走，杨昌濬率各营由安吉、孝丰（今并入浙江安吉县）追至安徽宁国县境，与刘璈部合击太平军，降七千余人。十二月，授浙江盐运使，旋升浙江按察使。四年（1865年）八月，左宗棠上奏清廷，称其“尽瘁驰驱，劳绩卓著”。^①五年（1866年）二月，擢浙江布政使。八年十二月，署浙江巡抚，九年（1870年）八月，实授。

“天津教案”发生后，英、美、法等七国联合向清政府“抗议”，并在天津、烟台集结军舰示威。十年（1871年）三月，昌濬亲往宁波、镇海，巡视海口，筹办防务。并上奏清廷说：“自强之计，宜用外人之器，师外人之长”。^②十三年十一月初四日（1874年12月12日），他又就海防问题上折，认为日本侵台事件虽已了结，但“难保不日后借端生衅”，“故为将来御侮计，非予筹战守不可。即为目前和局计，亦非战守有恃不可”，又称：

“外夷虽强，遇百姓齐心，即不敢显于众怒，固必整顿吏治，以固民心”。^③其时，浙江象山、宁海两县农民常偷渡去滨海“封禁”的南田岛耕垦，杨昌濬认为不应干涉，遂奏准弛禁。

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余杭发生了所谓“葛毕氏谋害亲夫案”（即“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当事人葛毕氏（绰号小白菜）与杨乃武在县、府两级均屈打成招，定成死罪。报省后，杨昌濬亲自审讯，他虽曾派员调查，但并未深究，仍按杭州府所拟“罪名”上报刑部。光绪元年（1875年），因地方士绅联名呈控，都察院御史劾奏，清廷下令复查，在京师开棺验尸，冤情始得大白。追究责任，杨昌濬以“既不能据实平反”，又对下属“始终回护”被撤职。^④

光绪四年（1878年）四月，左宗棠因西征事务繁杂，帮办刘典告病求去，遂上奏清廷，调杨昌濬代刘典主持后路军政事务。杨昌濬于十二月抵达兰州，帮办甘肃、新疆善后事宜，获四品顶戴。西上途中，他见陕、甘一带夹道种柳，即景生情，遂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王之涣“凉州词”中“春风不度玉门关”一句，热情歌颂清军西征，收复新疆的业绩，赋予了新的意境。此诗不但当时传诵肃州（今甘肃酒泉）大营，以后还长期留传民间。

五年（1879年），又获准专折奏事。九月，获二品顶戴，署理甘肃布政使。六年（1880年）正月，因筹解西饷出力，获头品顶戴。七月，左宗棠在哈密奉诏回京。十一月，杨昌濬护理陕甘总督，仍会办新疆善后事宜。七年（1881年）八月，授甘肃布政使。其时，甘肃士绅呈请为琦善（曾任陕甘总督）建专祠，杨昌濬据以入奏，为言官弹劾，受到申飭。九年（1883年）二月，任漕运总

督。

光绪十年七月初三（1884年8月22日），法国舰队袭击福建水师和船政局，造成很大损失。清廷以杨昌濬帮办福建军务（左宗棠为督办福建军务），七月二十七日（9月16日），又代何璟为闽浙总督，与左宗棠受命查办“会办海疆大臣”张佩纶临阵弃师潜逃事，复奏时，因语言含混，意在开脱，受到申饬。十二月底，与左宗棠亲临前线，出福州巡视闽江下游南、北岸，又至闽江口长门、金牌炮台视察，并检阅守军。

光绪十一年（1885年）六月，兼署福建巡抚。十二年（1886年），杨昌濬等上疏，指出：“台湾，南洋门户，七省藩篱，奉旨改设巡抚，以资控制，实为保固海疆远大之谋”，“闽、台并系一省，今分为二，尤须唇齿相依，以收指臂之助”。^⑤为了使台防能有确实保证，他积极设法筹措经费，建议由闽海关、福建各库局每年协银四十四万两，加上其他各海关协银共成八十万两。

光绪十四年（1888年）二月，调补陕甘总督。二十年（1894年）正月，因慈禧太后六十寿诞被赏加太子太保衔。二十一年（1895年）七月，甘肃回军起事，席卷湟中、河州（今甘肃临夏）、狄道州（今甘肃临洮）一带，杨昌濬因防范不严，镇压不力而被清廷革职留任。十月，开缺回籍。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在家乡病逝。

杨昌濬曾编辑过《平浙纪略》，后又与魏光燾等主持编辑了《平定关陇纪略》，并为之写序。

注 释

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5，第24页。

②④⑤ 《清史列传》，卷61，《杨昌濬传》。

- ③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60、61页。

主要参考资料

《清史列传·杨昌濬传》。

《清史稿·杨昌濬传》。

《赠太子太傅杨尚书行状》。

《左文襄公全集》。

曾 纪 泽

钟康模

曾纪泽（1839—1890），字劼刚，湖南湘乡人，国藩长子。在其父严格督促下，自幼究心经史，饱览古代典籍。他“少负隼才”，^①又刻苦自励，二十岁前就善古文辞，于群经俱有论述，对小学、乐律则尤为精通。随着年岁的增长，他逐渐发觉“经术何曾在章句”，意识到埋首古籍无补于世，遂开始“潜心有用之学”，^②研读龚自珍，魏源等人经世致用之书，认真“讲论天算之学，访求制器之法”。^③

曾纪泽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其父军营中度过的。长期的军帐生活，使得他不仅对军国大事有所了解，而且于“战守机宜，山川形势咸得其要领”。同治九年（1870年），他由二品廕生补户部员外郎。十一年（1872年），丁父忧在籍守制。光绪三年（1877年）服满，进京供职，袭一等毅勇侯爵，奉旨以四五品京堂候补。时值外患日迫，国土日蹙，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曾纪泽睹此时局，不胜愤惋。他既愤然于“西洋各大国，近者专以侵夺中华属地为事”，^④又对清政府靠出卖国家权益以求苟安的行径深为不满，认为“甘就偏安宋主孱，长城自坏非天慳”。^⑤历次对外战争的惨败，也在他思想上引起不少震动，促使他思索“吾华处处落后”和挨打的原因，开始留意西方各国情况，了解世界大势。通过观察和思考，他摒弃当时封建士大夫鄙夷西学的陈腐观点，主张向西方学习。为此，曾纪泽决心“精习西国语言文

字”。在“无友朋相与讲征”的条件下，刻苦自学英语，初步掌握了研究西方的语言工具。进而广泛涉猎近代西方的数学、物理、化学等书籍，并著文介绍推广。光绪三年(1877年)他进京以后，又有意识地结交一些外国人，如英国医生德约翰(D·John)，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等，通过他们进一步了解泰西各国政治、文化、民风习俗。终于对“海外诸大洲地形国俗鳞罗布列如指诸掌”，“中学西学一以贯通”。^⑥为他以后从事外交活动打下了基础。

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清廷诏命撤回驻英法公使郭嵩焘，派曾纪泽继任出使英、法大臣，他自此开始了外交生涯。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年)，曾纪泽一直是清政府的外交官员，奉命出使过英、法、俄等国。“弱国无外交”。一个沦为半殖民地国家的使臣要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与列强交涉、周旋，那是件极不容易的事情。然而，曾纪泽在出使期间，恪守“替国家保全大局”的信条，堂堂正气，不卑不亢，“身临危难……无一失体”，^⑦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尊严，力争民族的权益。不畏强暴，与列强折冲樽俎，在外交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

光绪四年(1878年)六月，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谈判索回伊犁事宜。崇厚在沙俄的胁迫愚弄下，竟于光绪五年(1879年)十月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几亚条约》。消息传来，朝野震惊。纷纷主张拒约惩崇，抵抗沙俄侵略。清政府碍于全国的舆论，于光绪六年(1880年)一月将崇厚革职问罪，并照会俄国：“崇厚所订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⑧同时，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谈判改订条约。

光绪六年(1880年)六月，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是时，沙

俄加紧对中国的战争恐吓活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英、法、美、德等国为了各自的利益，也纷纷压迫清政府。国内妥协派更是吓破了胆，主张默默吞下《里瓦几亚条约》这个苦果。李鸿章径自给曾纪泽去电，授意他向俄方让步，早日妥协了事。曾纪泽受命于危难之际，深知自己所担负的是一次艰巨的外交使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障川流而挽既逝之波，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⑨曾纪泽力任其难，决心对严重损害我国主权的条约进行改议，对国家领土“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⑩

在谈判过程中，他遇到的对手是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Н·К·Гирс），驻华公使布策（Е·К·Бюцов），外交部重要官员热梅尼（А·Г·Момини）等“阴柔狡狠”的外交老手。曾纪泽不为所屈，抱定“多争一分，国家少受一分损失”的宗旨，和他们“反复辩论，凡数十万言”，^⑪唇枪舌剑，进行了激烈的交锋。

七月四日（8月4日），曾纪泽初到沙俄外交部，商谈递交国书日期，吉尔斯等“面冷词横”，“厉色相待”，宣称对崇约“现在只候照行，无可商议”，断然拒绝谈判。曾纪泽熟悉国际惯例，从容指出：“凡各国定约必俟两国批准，方能俟行，如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并主动拟就改订新约的六条“节略”于七月二十四日（8月23日）送到沙俄外交部。吉尔斯看后恼羞成怒，大声吼道：“如此，是将从前之约全行驳了！”声明与曾纪泽无法商谈，拟另派布策赴北京交涉，并以战争相威胁。清政府大为恐慌，慈禧下令电告曾纪泽“总以在俄定议为要”。^⑫曾纪泽镇定沉着，从容应付；刚柔互用，不厌其烦地向对方阐明中国的立场，坚持在彼得堡谈判。

谈判的焦点集中在是否割地的问题上。沙俄官员软硬兼施，

百般刁难，企图迫曾纪泽就范；曾纪泽则据理申辩，“与之事事面争”，尽力推翻原约。对于索回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两岸富饶的广大地区，他全力争取，绝不松口，“不为俄少留余地”。布策提出如中国要特克斯川，必须割让沿海地方补偿俄国，曾纪泽严词拒绝，声明“自今以后，中国地土，断无再让之事”。^⑭热梅尼以战争相恫吓，公然要他申明永远不索伊犁。曾纪泽说，如果沙俄硬要这样，那清政府就将把前约全行废弃，暂缓谈判。进而严厉指出：“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⑮说得对方理屈辞穷，无言以对。不久，热梅尼在照会中又提出俄国因“遣船备边”费去卢布一千二百万元，要求中国赔偿，曾纪泽质问他们：双方既未打仗，何来兵费？对方声称：如不答应，则俄正欲一战，以补糜费。曾纪泽说：胜负难知，中国获胜，则俄国亦须偿我兵费。^⑯针锋相对，义正辞严，力挫沙俄凶焰。

复杂的谈判持续了七个月。由于曾纪泽的力争，加以左宗棠大军强有力的支持，沙俄官员感到非常棘手。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我们的示威没有使他们害怕”，“所以对于他不能再抱任何幻想”。^⑰最后，沙俄不得不放弃一些过分的勒索，放弃对《里瓦尼亚条约》的坚持，于光绪七年（1881年）正月同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

《中俄伊犁条约》仍然是个不平等的条约。但是，和崇厚所订的《里瓦尼亚条约》相比，毕竟挽回了一部分领土和主权，减轻了我国所蒙受的损失。“中国逼使俄国做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⑱这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是罕见的。曾纪泽对历史作出了他力所能及的贡献。条约签订后，“中外论者，咸谓此举殆中国办洋务以来所无”。就连吉尔

斯也不得不承认：曾纪泽“不惟出众于中国，亦罕见于欧洲，诚不可多得之使才也”。^⑩

光绪七年（1881年）七月，曾纪泽自俄返法。鉴于法国加紧侵略越南，他“屡与法国外部辩诘”，^⑪声明中国不能承认“法越前订之约”。法军攻陷河内后，曾纪泽向法国政府强烈抗议。他目睹法国资产阶级在国内掀起的侵略中国的热浪，写信给李鸿章说：“法人夙志，非徒并越，而特欲以越为根脚耳！”^⑫对法越构衅看得更深远一些。光绪八年（1882年）十月又从巴黎致书清总理衙门，强调“法人覬覦越南已久，越南危，非中国之福”，并向清政府提出了援助越南的七条办法。这些办法在当时应该说是外交上比较妥善的途径，却遭到李鸿章的驳斥。曾纪泽殊感愤惋，但仍以国事为重，接连致书总理衙门，提醒清廷对法国不要存“行险侥幸之心”，惟有“经武整军”，积极备战，才能“消弭此患”，一味妥协，只能助长侵略者的凶焰。认为法国侵略越南以来，朝廷对外交涉之所以“每况愈下，始终误于三字：曰柔，曰忍，曰让”。倘若“吾华早示刚严，则法人必不敢轻于举发”。^⑬

光绪九年（1883年），曾纪泽使法任期已满，但因法越事棘，奉旨留任。他一如既往，力持正论，不顾“每晨起辄咯血数口”，^⑭不断与法人据理争辩。在中法谈判中，曾纪泽的态度一贯比较强硬。他拒绝法国所提出的一系列无理方案，抗议法国侵略越南并据越南以侵略中国的阴谋，且将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诉诸世界舆论，使法国政府大伤脑筋。“法人畏避其锋，至不敢复与议事”。^⑮中法战争爆发后，他主张摒弃软弱的对外交涉，坚决抵抗法国侵略，“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⑯还不断把巴黎有代表性的报刊所披露法国政府侵略阴谋